

长期以来,宋庆龄的起居饮食都十分简朴。有工作人员回忆,1938年到1941年底,当保卫中国同盟(后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,现中国福利会)总部还设在香港时,宋庆龄每天的菜金就只有两角钱,而当时一瓶汽水也要这个数目。1949年后,她更是厉行节俭,早餐只吃两片面包,一杯咖啡或红茶,一只煎饼;午餐吃米饭,菜肴只有两荤一素一汤;晚餐只要一素一碗小米粥或泡饭就可以了。只有在家中来客人时,才会添上一些适合宴请的菜肴。

宋庆龄食蟹

朱贤晶

虽然在饮食方面奉行节俭,宋庆龄却仍对美食情有独钟,尤其喜爱烹饪。据她的秘书张珏回忆,宋庆龄的书房里有不少烹饪书籍。周末时,她会系上围裙,撸起袖子,到厨房里做些拿手菜,分送给友人和工作人员品尝。她烧的“鲫鱼塞肉”是公认的美味佳肴。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回忆,宋庆龄曾亲自教她烤羊腿,烧制咖喱鸡和西式什锦炒饭等。宋庆龄将李燕娥学烧的咖喱鸡分送给亲友和来访的少年儿童品尝后,大受受欢迎。这道咖喱鸡的做法如下:取适量大蒜、辣椒、洋葱,切成片,放两大勺红酒,半碗咖喱粉混合,下锅煎,加两茶匙盐,一茶匙糖,待颜色变棕后,将鸡块放入,并加上椰汁。鸡块煨软后,再加入土豆,煮一小时半。宋庆龄在家中宴请国内外友人时,最常出现的甜点是否仁豆腐和杏仁茶。她从不外面买的杏仁粉,而是自己将杏仁研磨成粉备用,使得这两道甜点的口感浓郁顺滑。宴请时,遇到感兴趣的外国女客人,她就即席用英语传授制作杏仁豆腐和杏仁茶的“秘方”。

宋庆龄喜食蟹,尤其爱吃家乡上海的水大闸蟹。然而,由于患有遗传性的荨麻疹,她每次吃完蟹就会过敏。大闸蟹每年金秋在国庆节之后、西北风起时,正是肥美时节。为了这一年只有一季的美食,宋庆龄每次吃蟹前,都先服过过敏药,然后才细细品味这人间至味。宋庆龄的生活管理员周和康每年此时都会去淀山湖选购一些大闸蟹,规格每只在十两以上(当时是十六两制,约当现在的六两多),洗净加工、细绳扎牢,然后放在竹制蒸笼里,配上紫苏清蒸吃。这时候,宋庆龄总会精挑细选,留出一部分最鲜活、最肥美的蟹,悉心包装后,给远在北京的同事、好友捎去一些,一同分享这收获的味道,有时,她甚至亲自坐火车将蟹带到北京分送。她的朋友和工作伙伴经济学家陈翰笙,原保盟秘书、廖仲恺之女廖梦醒等,也都收到过这份从上海专程而来的心意。宋庆龄后来在北京生活、工作期间,李燕娥和周和康还从上海给她寄“酒蟹”,宋庆龄非常高兴,上海人喜欢的醉蟹,也是她的“心头好”。

宋庆龄吃蟹有一套专门的工具,现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里保存着。这是宋庆龄赠送给周和康作为纪念的一套三件食蟹工具,原先是周从锦江饭店为她订购的:木制的小榔头,圆形的小砧板和一把银质的钳子。1980年,宋庆龄自己还曾写信给德国友人王安娜,请她托即将来华的斯诺夫人洛易斯·斯诺带至少4把小的胡桃钳,用以钳蟹脚。北京宋庆龄故居至今保存着一套八件吃蟹的工具,据说,那是宋庆龄收藏的、孙中山先生用过的蟹具。

1976年,“四人帮”轰然倒台后,全国人民奔走相告,纷纷买酒庆祝。当时正是吃蟹的好时节,人们在买蟹吃蟹时,必然要求“一母三公”,以泄怨气。宋庆龄喜欢吃蟹黄满满的母蟹,但她却毫不犹豫地说:“先吃‘一母三公’再吃母的!”不久,她特地写信提醒巫友、国际著名记者、作家爱泼斯坦,告诉他“现在是(吃)那些‘横行夫人’的最好时节。如果你和邱茉莉(爱泼斯坦夫人)这个时候能来,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南方的特别风味。”宋庆龄甚至给原保盟中央委员邓文钊之子邓广殷抄了一首名叫《卖螃蟹》的民间歌谣:“西单卖蟹众称奇,一母三公搭配齐。道似一锅烹四害,横行看彼到何时。”

宋庆龄被誉为“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”“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狮子”。她在平凡的生活中,喜爱烹饪,尤其爱吃上海的水大闸蟹。作为“阿拉上海女儿”,宋庆龄的巧思也许不止在斗争岁月的轰轰烈烈之中,也在一只蟹的五味杂陈和温存细腻之间。



时尚

“人证”难题
陈奇

老朋友聚会上,老刘谈到了件烦心事。到银行办理开户,银行小姐给老刘进行人脸识别,但弄了半天总是无法通过。找来主管,几个人搞了老半天也不行,主管说:你身份证上的照片和你的脸差异太大了,机器通不过,按照央行规定,没有办法办理。老刘说:身份证上照片到现在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,照片上的我当然是大不相同。相信再过二十年会更加难以相认了。话题聊开了,大家也纷纷“诉苦”,老邓说:拿着身份证到邮局取邮件,邮局工作人员拿着身份证横着看看半天,还要问“是不是你啊?”老孟说:到电信营业厅办理手机套餐,客服也是一会儿看身份证,一会儿看人,眼光怪怪的,让人感到很不舒服。笔者自己也常常碰到办事时,由于“人证”配不起来,被人报以怀疑的目光。为了避免以后麻烦,我特地跑到派出所询问是否能够重新置办身份证,派出所民警告诉我身份证更换,只有身份证遗失和到期,其他都不能更换。



金秋时节,为庆祝夫人生日,我们一家陪同老岳父在南京东路外滩旁的和平饭店住了一晚。深夜,躺在柔软的被褥间,想着这个饭店自从1854年初创至今,有多少名人曾在此下榻,卓别林、萧伯纳、鲁迅、周恩来、克林顿等等,兴奋之余难以入眠,迷糊一阵,凌晨三点又醒了,再无睡意。秋高气爽,温度宜人,一个奇怪的念头一闪:何不去外滩看日出!我年轻时曾在泰山玉皇顶看过日出,一大群军校同学趁部队实习的间隙,一口气从山脚冲上山顶。后半夜山顶黑灯瞎火,我们穿着租来的军大衣,冒着夜雾站在湿漉漉的岩石上等候太阳升起,那时候年轻,浑身是劲,心里装满了理想和梦想;也曾与浙江省的一群儿童文学作家,在普陀山的百步沙看硕大的太阳从东海浴水升腾,鲜艳的火球被上下拉长,突然间跃上海面数尺

在外滩看日出

周建新

了鲜明的对比。走到中山东路路口,见少量出租车与公交车驶过。外滩观光平台上更是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”,显得格外宽敞而空旷。万国建筑群矗立在街灯的黑影之上,似乎还在夜色中沉睡,唯有海关大楼高高的两面大钟的灯光,像一对圆鼓鼓的眼睛,警觉地注视着这座百年沧桑的“十里洋场”。静静的江面显得异常开阔,偶尔有一两艘货轮在江面行驶,发出轻微的突突突的轮机声,仿佛架子鼓上的轻微的敲击声。



鹤鸣芦荡 方忠麟 摄

灰羊绒小西装外套,同色系呢格鱼尾裙,长袜、短筒靴,一身黑灰看上去略沉闷,头上倚斜一顶皮粉贝雷帽,如陈旧房子加了软装,顿时古雅靓丽了。贝雷帽是我钟爱的,扁塌塌很好收藏,毛呢、绒线、亚麻等不同材质和颜色的有五六顶,时尚、百搭。“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,你戴着灰贝雷帽,心绪平静。”这是诗人聂鲁达写给常戴灰色贝雷帽的恋人阿尔贝蒂娜的,诗中贝雷帽这一意象,似乎与爱情之间只差一顶帽子的距离,读来又美好又惆怅。画家里爱贝雷帽的尤多,伦勃朗和莫奈的自画像,都头戴贝雷帽。还有只戴法兰绒黑色贝雷帽的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,他说得尤其动情,“没有帽子头脑就被寒风吹彻,就画不出任何画”。以至于杂志记者专门去问手冢夫人:先生洗澡的时候,会不会摘下帽子?艺术家的外在形象,是想象力、才华以及自身独特生活美学的写照,容易对大众造成强大的感召力,不然贝雷帽何以叫画家帽?秋冬的衣服颜色过于素雅,又不想无节制买新衣,选几顶合适的帽子搭配,保暖的同时不用费心打理发型,最重要的是,能让旧衣焕发新意。等于闲置资产得到利用,重新发挥光和热,这叫欢喜。除了贝雷帽,深得我心爱的还有报童帽。日常喜欢穿棉

两个半小时,从黄山东站开出的高铁动车到达上海站。上海,是我熟悉也是感念至深的中国城市。我的太爷爷、爷爷曾经是徽商,在这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;老家半个村子的家业或可见证。我的父亲出生、读书在这里,是上海多福里拿奖学金最多的“学霸”。只因后来生意式微,家道中落,父亲被爷爷懵懵懂懂带回徽州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回到徽州农村的父亲就成了这样的人。以体力、劳力、工分为要紧的农村,让只会“啃”书的父亲价值感丧失。不过父亲并没有就此自暴自弃,而是主动去适应农村。他不但学会了干农活、挑重担,还通过自己的“小聪明”,发明了生产队的第一台框架式插秧机,后来还尝试了圈养鸭子、种植大棚西瓜等,试图“科学种田”,但也因“水土不服”失败。父亲后来算是“专业对口”,当上了大队出纳、会计,但他“上海佬”的“名声”算是背了一辈子。

这次来上海,是作为市里“体悟实训”的一员被派到《新民晚报》“跟班学习”。记得我刚从部队转业到报社工作的那会儿,父亲还在世,喜欢看两份报纸,一份是《参考消息》,一份是《新民晚报》。我对《新民晚报》也因为父亲的原因情有独钟,并曾多次向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副刊投过稿,后来发表过一篇,父亲却已经去世了。本想让父亲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儿子写的文章,最终未能实现。父亲爱看上海的报纸,还跟他的母亲、我的奶奶何宝玉是上海人有关。我至今收藏着唯一一张奶奶的照片,那是她和爷爷的合影。20岁岁的奶奶,身材高挑、一袭旗袍、波纹刘海、眉目清秀,绝对是旧上海的美女范。可惜,奶奶30多岁就去世了。父亲说这跟她回了一趟徽州有关。那时候从上海到徽州,只有水路,奶奶跟着爷爷从上海坐船,还带着缝纫机,转杭州到徽州,从马路走水路转公路,行程千里,整整一月,舟车劳顿到了徽州休宁月潭老家。可是爷爷竟然在老家有了一房(大老婆),于是奶奶一气之下,又独自乘船回到上海,后来就生了病,英年早逝。

因为家庭与上海的关系,自然我的灵魂深处会偏爱上海。从事媒体工作以来,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,前两次是报社策划的“黄山人在他乡”,采访了不少在上海创业的黄山人。新黄山人沿着古代徽商的足迹,以吃苦、诚信、开拓、崇文的徽商精神继续前行。黄山与上海,除了数百年前同属一个江南省的“兄弟”,两地并不在一个城市层级上。然而两地渊源很深,因为无数徽州人在上海经商后回乡创业,黄山有“小上海”之称;而上海,在上个世纪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“三线建设”时代号召下,成千上万的上海人涌向黄山,在这里挥洒青春和热血。新时代,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下,如今仍有近10万黄山人在上海务工创业;而上海更是黄山重要的旅游客源地。黄山与上海,新安江与黄浦江,迎客松与东方明珠……“名城名山”正亲密牵手,共同抒写新时代的“山海情”。

只是诗人的一种想象,但将浦东与浦西紧紧连在了一起。“啊哦”,观光台上有人呼唤起来,我旁边正在摄影的一位外国友人也惊叫“beautiful”。太阳正沿着上海中心的身躯冉冉升高,它耀眼的光芒,照在浦西外滩的建筑群上,使这些形成于上世纪初的优秀历史建筑一下子获得了光明,恢复了新的生命活力。在海纳百川的外滩迎接第一缕阳光,我感受到似一条黄金制成的带子,与以往不一样的盛景!

就是明朝时男人盛行戴的小帽,六块等腰三角形逐一缝合,顶上有结,下部一道一寸左右的帽檐。朱元璋亲自设计的“六合一统”帽寓意江山一统,很有政治色彩,好玩的是,出现在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中。男主Leon便戴了瓜皮帽,加上圆框墨镜,法式雅痞绅士混搭造型,可谓深入人心。如今的瓜皮帽后有收缩搭扣,反戴在前,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俏皮。冬天受众最广的当数冷帽。英文名beanie hat,翻译得很直观很具体:豆豆帽。戴上这种紧贴头皮的帽子,头很像一颗圆润的豆子。少女时代的豆豆帽是妈妈手工织的,橙黄色,螺旋纹,有弹性。臃肿的碎花棉

七夕会

我的「山海情」

程向阳